

洋务先知

◎ 孟泽 著

郭嵩焘

傳神流傳萬代千齡
定後人間有此人世人欲
定乃才迂拙頻遭反噬
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
幾骨閑
玉池老人自題
洲澤郭必芳

洋务先知

◎ 孟泽 著

郭嵩焘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洋务先知:郭嵩焘/孟泽著. —南京:凤凰出版社,
2009.4

ISBN 978-7-80729-358-3

I. 洋… II. 孟… III. 郭嵩焘(1818~1891)-
传记 IV. 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5023 号

书 名 洋务先知——郭嵩焘

著 者 孟 泽

责任编辑 韩凤冉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
发行部电话 025-83223462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
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:210037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32

印 张 16.25

字 数 249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358-3

定 价 28.00 元

(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电话:025-85521756)

前言

郭嵩焘(1818—1891),湖南湘阴人,与曾国藩、刘蓉有金兰之谊,与左宗棠是“发小”,与李鸿章、沈葆楨是“同年”。他跌宕辛苦的生涯,遭逢了中华民族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

郭嵩焘的知名,并非如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等所谓“中兴”名臣那样,因为有显赫的“功业”,而是作为“湘军”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,作为“精透洋务”的洋务先知——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,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——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、法国,显示出了不同常人的思想、精神与人格魅力。

郭嵩焘曾经供职翰林院和南书房,参赞僧格林沁军务,稽查山东沿海厘务,署苏松粮道与两淮盐运使,巡抚广东,是晚清内乱内战和两次鸦片战争的亲历者,又“以老病之身,奔走七万里”,作“赔罪之旅”。在此过程中,逐渐形成了关于国务,特别是有关洋务的卓越见解。

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,对于现实的检讨与未来的认识,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。

正因为如此,他的生平和仕途,更加举步维艰,坎坷不断,充满争议、攻讦、毁谤,也充满传奇色彩。

解读郭嵩焘的生平,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,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,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,领略一个“芬芳悱恻”的性灵,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。

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,在至今并未出离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时,也就是说,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,中国的现代转型,依然未完成时,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。

目 录

第一章 身世与家国 (1)

出身“富甲一方”的家族，但在郭嵩焘成人时，家庭仅及中产。他的命运与水有关。道光十六年，不满 20 岁的郭嵩焘与曾国藩、刘蓉在长沙一个客栈里因为相互倾慕而“同居”两月，“乐莫乐兮新相知”，这是一次多少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令人心驰神往的聚会。

第二章 疆场与战场 (16)

战争对于一个人的洗礼常常是刻骨铭心的，何况是一个年轻人，一个“好谈形势”“自许从戎”并且试图有所担当的才俊之士。郭嵩焘在浙江游幕时，赶上第一次“鸦片战争”，这让他直面了“洋夷”，空疏的抱负也由此转变为有关“家国天下”的明确使命。接下来，率勇出征，躬身战场，替“湘军”筹饷，为曾国藩办事，见识上海“洋泾浜”——中国最早的“西化”样本。

第三章 从翰林院编修到南书房行走 (32)

江南战事，了犹未了，郭嵩焘进京就任翰林院编修，很快获得咸丰的信任，成为皇帝近臣。进入南书房不久，又前往天津“挂职锻炼”，参赞僧格林沁军务。然而，让郭嵩焘始料不及的人生坎坷，就在他和僧格林沁的共事开始。

第四章 参赞僧格林沁 (41)

参赞僧格林沁军幕,“秀才遇到兵”。“王大臣”僧格林沁获得庚子(1840年)以来对洋人作战的最大胜利,举朝欢呼,郭嵩焘也获得褒奖,但他反而落寞。以钦差身份赴山东沿海稽查厘务,郭嵩焘乘兴而去,狼狈而归,降二级调用,继续作为南书房行走。

第五章 国变当前 (61)

似乎有先见之明,郭嵩焘居然主动请辞,辞去南书房职务,离开北京,让人大感意外。回家一个月,北京被英、法联军攻陷,咸丰逃亡热河。曾经有所预判的事情,一一成为现实,郭嵩焘既悲伤又愤怒。他不曾预判的朝廷变故和家庭变故,也接踵而来:太后垂帘,朝中故旧或被砍头,或被流徙,自己幸免于难,发妻亡故。

第六章 巡抚广东 与左宗棠陌路 (73)

洋务窘迫,内务更加蜷缩。同治改元后,郭嵩焘应李鸿章之奏请,慨然赴任江苏,理财行政,表现堪称完美。仅仅一年,朝廷任命为广东巡抚,令其火速赴任。封疆大吏,郭嵩焘无意中得之,亟欲一展抱负,然而,却最终遭遇解职,郭嵩焘难免抑郁不平。与左宗棠生嫌隙,更让他痛心疾首。

第七章 长沙地主 一窍不通 (110)

卸任返回长沙,郭嵩焘乡居八年,应对的是故乡人事和自己的家事,并不宁静。他最看重的儿子英年早逝,伤感伴随了他整个下半生。老友曾国藩、刘蓉千古,湖湘三人行,仅存他一人。他从天地气机,从当局者的行止作为,感觉到国事的紊乱和时地的荒凉。

第八章 夷务洋务 进退失据 (127)

在内外交迫的危机中,朝廷诏命郭嵩焘进京待命,郭嵩焘以接近花甲之年再次躬身洋务。针对云南“马嘉理案件”的发言,让郭嵩焘置身舆论的风口浪尖,他的形象被“妖魔化”。朝廷任命他出使英国,郭嵩焘不敢指望

有所作为,七次上书,请辞出使之任。

第九章 为国家任此艰苦 (144)

慈禧太后慰留郭嵩焘,要他为国家任此艰难。郭嵩焘黯然出使。大臣西行,这是清朝第一遭。公使任上,郭嵩焘如鱼得水,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,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。感叹国家迟暮,自己“年老失学”。

第十章 西洋镜 有本有末 (155)

对西方的观察,使郭嵩焘懂得,西方文明“有本有末”,从器物、商贾、学术、制度,到人心风俗,层层推进,系统联动。列强之所以强盛,动力之后有动力,原因之后有原因,得其皮毛而不得其实质者,将无所作为。对于自身文化传统,他因此有更真确的反思。

第十一章 与严复交好 “国士之知” (178)

郭嵩焘与比自己小不止一辈的留学生严复,一见如故,以“国士”许之,勉力让他学有所成。严复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启蒙者的生涯,从与郭嵩焘的交往中开始。

第十二章 与刘锡鸿交恶 “十宗罪” (184)

副使刘锡鸿,劾奏郭嵩焘出洋以来“十宗罪”,舆情汹汹,郭嵩焘无可表白,与刘锡鸿誓不两立,双双被撤。郭嵩焘意识到,刘锡鸿“一诋张为幻之小人,何足与较,然其中消息绝大”,集体性的士大夫文化人格的分裂及其病变,昭然若揭。郭嵩焘决定不再返回北京。

第十三章 失败者的骄傲:不忍不谈洋务 (209)

未告老而还乡,郭嵩焘绝望于朝廷,也绝望于洋务。然而,伊犁事件,琉球事件,中法战争,眼见家国危殆,郭嵩焘“不忍不谈洋务”。曾国荃说,朝廷无人,仅得一贾生(指郭嵩焘)又不能用,那么,只有痛哭流涕了。

第十四章 生前身后 百代千龄 (224)

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长沙去世。李鸿章等人上疏,请求朝廷将他的学行政绩,宣付国史馆立传,并予赐谥。朝廷一句话的旨意是:“郭嵩焘出使外洋,所著书籍,颇滋物议,所请着不准行”。“颇滋物议”的郭嵩焘,晚年作《戏书小像》诗,未盖棺而“先知”般自我预言:“流芳百代千龄后,定识人间有此人”。今天看来,言之有据。

附录:“汉奸”与“先知”(“湖湘讲堂”答客问) (235)

后 记 (248)

第一章 身世与家国

出身“富甲一方”的家族，但在郭嵩焘成人时，家庭仅及中产。他的命运与水有关。道光十六年，不满20岁的郭嵩焘与曾国藩、刘蓉在长沙一个客栈里因为相互倾慕而“同居”两月，“乐莫乐兮新相知”，这是一次多少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令人心驰神往的聚会。

郭嵩焘生于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初七(1818年4月11日)，家在湘阴县城西。湘阴位于洞庭湖东南，长沙以北，立县至今近千年。清朝，湘阴县属长沙府。在这里，很早就设置有水陆驿站，“水程之四达者，亦与陆程相准”，可谓“通达之地”。郭嵩焘在《湘阴县图志序例》中，称湘阴为“南北通衢”^①。

湘阴县北七十里，是汨水、罗水合流的“屈潭”，或称“汨罗江”，即屈子自沉处。南来的是滔滔湘江，资水在这里汇入，一起流向洞庭湖，然后通江达海。此地风光水性，自然影响着民情民性。屈子、汨罗江所暗示的是一种倔强的坚持和守护，一种充满悲情的豪迈，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”，“秉德无私，参天地兮”，《橘颂》中的诗句，是对于忠贞之性的自我许可和召唤，对于“独立不改”的人格的歌颂。而“智者乐水”，水是通达和包容的，充满灵性并且一往无前。湘阴的水面，何其广大，来得远，去得远，几乎无始无终，无可限

^① 《郭嵩焘诗文集》107页，岳麓书社1984年。

定，可以容纳没有边界、没有尽头的想象。

郭嵩焘当年应该不止一次领略过《庄子·秋水篇》中河伯感叹过的风光。河伯看到秋水灌河，对岸不辨牛马，以为这样的水面是天下最大的了，可是当他顺流东下，走到北海，他望洋兴叹了。他发现，那才是真正的无边无际，他说他真的是贻笑大方。河伯“望洋兴叹”的感慨，郭嵩焘一定心有戚戚焉，他也一定明白，天下多的是没有见过北海的河伯。



湘阴县北的汨罗江畔屈子祠

如果说，这就是风水，那么，郭嵩焘就是从这样的风水中走出来的。其中有忠贞之性，有认死理的固执、自信——自我认同。他的情怀正如《橘颂》所歌唱的，“受命不迁”“独立不改”。同时，他还成长了明敏的心智和宽容的视界，从这里，他经略南北，远涉重洋，终于拥有罕见的开放见识与胸怀。

郭嵩焘乳名龄儿，学名嵩焘，字伯琛，号筠仙，别署“云仙”“筠轩”，因为太平军兴时曾经避居湘阴县东之玉池山，又称“玉池山农”“玉池老人”；因为后来在长沙筑室曰“养知书屋”，学者称为“养知先生”。

按《湘阴郭氏家谱》，郭嵩焘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唐代郭子仪的六世孙、南唐广国公郭晔。这是旧式族谱的惯技，未必确切。攀附名人的虚荣，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。郭家在他的曾祖父郭熊（号养湖）时，号称“富甲一方”，就是今天所谓“首富”。

他的祖父是一个豪爽慷慨的人，“性豪迈，尚气谊，然诺一语，斥千金不惜。尝制一狐裘（今天谓之“皮草”），甫成，客至，挈之以去，亦漠然不以为意”。借钱给人，不一定要求在什么时间收回，也不规定一定是多高的利息——“不刻期，不责息”。但是，这样做，不仅赢得了口碑和声誉，而且“息反赢”——利息更多。寄祖父（他的儿子——郭嵩焘的父亲，是过继的）据说也豪爽，沉静“而好深沉之思，尤喜济人之急，推解无难色”。

郭嵩焘的祖父辈，已经有人有“功名”。在传统社会，一个家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，常常会让子弟朝“功名”路上走，心性也容易走向“豪爽”一路。钟叔河先生认为，郭嵩焘不轻商，谓“用才各有所宜”，日后在长沙禁烟会上甚至说“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”，以至为人所诟病。此种观念可能与他的出身有关。他们家有经营商业和利贷的传统，到郭嵩焘父亲时，仍然经营借贷^①。见识了从商者的辛勤刻苦，包括他们的仁厚，就不会先入为主地以“无商不奸”的纯粹道德眼光来看待天下的商人，就不会把商业看成是腐蚀性的，不仅对于“正业”、“正经”，而且是对于人性的腐蚀。

郭嵩焘的父亲郭家彪，字春坊（1794—1850），是一位好好先生，喜欢帮忙，“精医，岁储药饵，供人求乞”，这是急人之难所必需的手艺，所谓“悬壶济世”，“不成良相便成良医”，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。在古人眼里，医人医国同出一理，医国医人同样是救世济民，这是一种有着很深传统的世界观。郭嵩焘的母亲（张姓）是长沙一位读书人的女儿，守礼法，重视子女学业。

因为“形势”，也因为传统大家庭多子女的“分割”逻辑（曾祖父六子，祖父四子，女儿还不算在内。沈葆楨的妻子，林则徐的女儿林普晴活到53岁，育有10个儿女，闭着眼睛想一下，女人在能够生孩子的年龄几乎都在生孩子。当然，如果吃不饱，以至丧失了生育能力，就不能生了），郭嵩焘出生时，他们家已经“日

^① 《从东方到西方》234页，岳麓书社2002年。

趋虚乏”了，仅有几百石的田租，“每岁衣食足资取给”。道光十一年辛卯（1831年）以后，“连年大潦，皆围业也，坐是益困于水”，甚至不能维持小康。

即使这样，他的父亲也是“夷然不为有无顾虑”，仍然急人之难，亲戚故旧有借贷，尽量满足，或者向另外的人借贷，由他一句话做担保，到时候人家还不了，他就代偿。因为是有钱人家出身，对钱似乎看得不重，正像一个人因为没钱，反而很在乎钱，因为贫贱，所以很在乎富贵。

郭嵩焘曾经在所修《湘阴县图志》中录有他父亲郭家彪的一首“守愚诗”，有儒者气象，也有道家风度。诗曰：

世人顾我笑，谓我性拘迂。我笑谢世人，巧者拙之奴。人生各有役，安命乃良图。争先趋捷径，足不履康衢。荆棘能挂身，难免颠蹶虞。适口必肥甘，菽粟或嫌粗。腐肠生疾病，属餍胡为乎。勿损人为智，勿私己为愉。欺人即欺心，造化焉可诬。人自习为巧，我自安其愚。情以愚而厚，气以愚而孚（孚，使人信服，深孚众望，此处意为充沛）。性愚故能定，貌愚故能腴（与所谓“精瘦”相反，胖的人往往容易被看做憨厚笃实）。守愚果愚哉，吾亦见真吾。

安于拙而固于穷，不欺心欺人，尽性知命，这与其说是道家的清净自守，不如说是儒家的恬澹有节。孔子曰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”，意思是说，那种太容易根据别人的需要来花言巧语和变换脸色的人，很少宅心仁厚的。曾国藩有一句很有名的格言说：“惟天下之至诚能破天下之伪，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巧。”也有差不多的意思。

母亲的克己待人，父亲不私己不损人的“守愚”哲学，影响郭嵩焘无疑。晚年郭嵩焘在所作《玉池老人自叙》中说：“其初仕宦，即自誓不以不义之财留貽子孙。”这是一种义理的服膺，也是一种教养的体现。

郭嵩焘的叔伯辈中，很有一些奇人，这些人同样影响过郭嵩焘的成长。

叔父郭徵畴（西清），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举人，此人“勤敏精锐，遇事应机立断，厘剔积弊，维持大体，略无引避”。1848、1849年湘阴连续遭遇洪水，救灾的赈务，郭徵畴一个人主持，据说活人无算。此人有足够的才能“治生”，但“积产甚薄，而岁所施舍常数倍于所入”。

堂伯父郭家骥，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，性格尤其鲜明：“少负才气，纵横捭阖，诙奇自喜。晚乃折节为端谨，杜门不通宾客，而上自生民利病，国家制度法令，下至市物贵贱，言之历历不爽。”

堂伯父郭家陶（钧台），贡生，此人“沉练精敏，通知人情，而崭然一出于正”。

郭家陶曾经“伟视”少年家贫的郭嵩焘，说“是子必亢吾宗”。郭嵩焘自己在家谱杂述中描述，少年读书时，天气很热，伯父郭家陶与几位朋友在阶下纳凉，见郭嵩焘仍然默坐在书斋中用功，伯父对朋友说：“龄儿遇事恂恂（恭敬诚实），独其读书为文，若猛兽鸷鸟之发，后来之英，无及此者。虽少，然观其志意，无几微让人，岂徒欲为诸生之雄哉。”

这段话也许是伯父故意说给郭嵩焘听到的，伯父其实未必会记在心上。但可以想见，对于少年郭嵩焘的暗示和影响有多么重要。因为郭嵩焘不仅听到了，而且“大喜过望”，铭记终身。他一定常常以此自励自勉。而他日后所发育出来的心性，似乎也符合郭家陶的观感：恭敬诚实，但读书作文，极有个性，所谓“猛兽鸷（猛兽，鹰或雕之类）鸟”，显然还不是一般的个性，而是比喻某种特别的洞察和捕攫的能力，可以成就创造性的思想、发现和表达。而所谓“志意”“无几微让人”，也就是好胜、自负、当仁不让。

类似的被鼓舞和被暗示，郭嵩焘还记载过两次。

一次是在湘阴仰高书院读书时，同学吴樾（西乔）与他互相视为“畏友”。郭嵩焘成为秀才那一次，吴西乔报罢，于是发愤而归，“键户读书。逾年，见其文，大惊。西乔曰‘吾比年出入《史》《汉》，沉潜于诸子百家之文，自谓有得也’。予闻内惭，乃益研精覃虑，伏而读，仰而思，得文二十余篇。西乔见之亦大惊，持视钟君情田。情田叹曰‘百年无此作矣’。情田，邑名宿，老于文律，于人鲜所许可。闻之，亦窃自喜。予未弱冠邑人士谬谓能时文，由西乔、情田两君发之也”。吴西乔后来成为进士，历任浙江昌化、山阴、黄岩知县，亢直勤廉，有口碑，卒于黄岩。钟情田则没有赚得科名，老而游幕，“抑郁以终”。但“肆力于诗古文辞”，虽然“足不出里巷，其所考订阐扬，多关系一邑人文风化，其文有不可泯者”。郭嵩焘曾经为他死后编成的《诵芬书屋集》作序，“序其文而益怀老成凋谢之悲”^①。

^① 《郭嵩焘诗文集》100页，岳麓书社1984年。

另一次对郭嵩焘有所鼓舞和暗示的，是刘蓉父亲的一个说法。刘蓉的父亲在“太平天国”还没有起事前对曾国荃（1824—1890，早年跟随曾国藩筹组湘军，咸丰六年开始独立领军与太平军作战，最终攻下南京，先后任湖北巡抚、山西巡抚、两广总督、两江总督）说：天下之乱已经有预兆了，现在在位的这些人，没有人可以堪当大任。将来能够堪当大任的，是我们的曾国藩吗？“君与湘阴郭君及吾家阿蓉，皆中兴之资也”^①。郭嵩焘记录此事，意在述刘蓉的父亲“诙奇有才识”，而让我们更多感受到的，却是伴随他成长的那种通过别人的期待而生发的自我期待。

郭嵩焘有两个弟弟。崑焘（号意诚，1823—1882），小他五岁，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举人，历任张亮基（先作为湖南巡抚，后任湖广总督）、骆秉章、毛鸿宾等的幕僚，“以身任湖南安危二十余年”。但事遂而身退，晚年就养浙中（跟随儿子郭庆藩）。崧焘（号志诚，1827—1880），小他九岁，主持过岳阳厘务、救生局。曾国藩、胡林翼、李鸿章曾经想有所倚重，均辞不赴。他的解释是：“某以病躯，出而随俗，苟且任事，则负初心。若事事求实际，则精力稍欠一分，功效即亏一分，国与民交承其敝，故不为也。或乃指为高尚为怀，安岂知我者哉。”意思是说，自己身体不好，如果做官，苟且应付，那就有违自己的志向抱负；如果事事认真，精力不济，精力不济，做事的功效就会亏欠，一亏欠，国家和人民还是会因此吃亏，所以只好不去做了。别人以为我“高尚为怀”，哪里算得上是懂得我的人呢？

曾国藩曾说，“湘阴三郭，论学则一二三，论才则三二一”。

胡林翼曾经也有过类似说法，“往胡文忠公论吾兄弟之才，以谓意诚视吾为优矣，志诚又益优”^②。意思是说，论才能，他的大弟弟比他好，小弟弟更好。郭嵩焘在《蛰存罗华山馆遗集序》中，对此有所诠释：“顾念吾兄弟三人，皆稍能读书求有用之学。吾性卞急，于时多忤。意诚稍稍能通方矣，而怀敛退之心，履贞介之节，终不肯一自试其用。君（志诚）独以才自喜，乐以其心与力推而致之于人，而亦终身望见仕宦戛戛然去之。其施也不暇，其欲以公之人，终亦阂（音厄）而不流。情性固然耶？无亦有不达其志而因以自沮耶？当同治之初，天下蒸蒸

① 《郭嵩焘诗文集》391页，岳麓书社1984年。

② 《郭嵩焘诗文集》312页，岳麓书社1984年。

向治，道固昌矣，君于是时，亦思奋而求效。夫君子之于世，固求有以自达，折冲尊俎与其效命疆场，等耳。不能达而强之政，既从政矣，而固多方遏抑之，使不得达，君子诚惧乎此也。《诗》曰‘终其永怀，又窘阴雨’，君惟知之，而终不以一试，其斯可与言《诗》矣乎。”^①

从郭嵩焘的表述看，似乎还是一种他父亲式的清洁淡泊和求完美的理想主义，让他们不愿意轻易下手或难以下手，包括郭嵩焘，虽然几次出仕，跃跃然要一试身手，但一旦受挫，就不愿意在自己不乐意的处境中待下去。他们都不是那种野心勃勃、心狠手辣的人，也不是那种权力欲很重的人。而是内心“芬芳”，精神卓越。郭嵩焘晚年说，他们三人“生平有同有异，有离有合，而其志趣之所及，皆非今世有也”^②。此话的意思是说，他们的精神都不是他们所在的时代可以范围的，他们的“志趣”甚至就不是他们所在的时世所能拥有，所能接纳的。

因为所思高远，见识广大，富有洞察力（不止是取决于聪明与否，还与气质有关。一个人的见识高明与否，联系着他气质中的清浊成分，这种清浊又联系着欲望，当然，其中并不是一对一的关联。越是见识高明，往往心性高迈，内心清澈，就是能够超脱，也就是不被某种欲望锁定。利欲可以熏心，但是，欲望毕竟是生命的原动力，对于卓越知性的追求也未尝不是一种欲望），眼界和价值理想非一时一地的功利可以笼络。因为敏感于忧患，忠诚于使命，又兼“理想主义”的急切，遇事则难免感同身受而生发议论，议论自然多批评，批评难免针对现实，于是容易让人以屈原、贾谊视之。一旦以屈、贾视之，在功利主义至上的官场上，就很不容易立身，就很容易成为“潜规则”的局外人。

这一点在郭嵩焘身上体现得最充分。

郭氏三兄弟在日后的生涯中，充满了同情、理解、顾惜、爱重和绵绵的相思，两个弟弟对于多历失败、“世人皆欲杀”的长兄，有着既理性又充满手足之情的理解和支持，而兄长对于手足的信任和爱重，几乎是无条件的，特别是两个弟弟都先郭嵩焘离开人世，意诚 59 岁去世，志诚 53 岁去世，由此带来的感怀和悲伤，流露在郭嵩焘的文字中，常常浸透骨髓。

① 《郭嵩焘诗文集》64 页，岳麓书社 1984 年。

② 《志诚五十寿序》，《郭嵩焘诗文集》313 页。

毫无疑问,那种与伦理有关的情感,是汉文化中表达得最出色的一种,如“慈母手中线”“明月几时有”,都是让人一想起,就难免要潸然落泪的诗句。

郭嵩焘最初由父亲受学,他父亲甚至专门编了一本教材《训蒙真詮》。这本书在他父亲死(1850)后被人偷去(显然,是别人认为郭家有考试秘笈,因为此时郭氏兄弟至少算得上岳阳本地的“考试状元”了,郭嵩焘 1837 年中举,1847 年中进士,1844 年郭意诚中举)。父亲启蒙之后,郭嵩焘所受的教育即是科举训练。道光十五年(1835)与弟弟意诚一起补博士弟子员,即成为秀才。

在湘阴读书期间,郭嵩焘就认识了左宗棠(1812—1885),日后“至交三十年”。作为“发小”,他们之间的恩怨,意味深长。



湘阴县文庙,郭嵩焘早年就读之所

且不说对于左氏来说,郭氏曾经有过何种恩泽,左宗棠给予郭嵩焘的打击,却构成了郭氏晚年最重的一个心结,让他特别沮丧,他甚至因此感到痛生不知如何自持和自遣。是对于对方人格或能力的看破?是功利目标驱使下的友谊背叛?是出于对国事的担当和个人的远大抱负不得不如此选择?或者纯粹是郭嵩焘的狭隘或狷急?这是后话,暂且不表。

道光十六年(1836),郭嵩焘为考举人,读书于岳麓书院。在这里,他结交了终生的朋友同邑唐曦臣:“余年十八,读书岳麓山,得交唐君曦臣。是时曦臣年

二十六，貌恂恂，若不足于言，而与之论辩事理，多微中，同舍生皆目为长者。其后别去，或十余年一见，或间岁数月一见。见则恳垦劳问，如始相见时。盖三四十一年之间，人事变迁多矣，独君与人交，自少迨长，其情常若有余，无损益于其初，庶几惇笃有常之君子也。”后来郭嵩焘支持修《湘阴县图志》，“讨论山川会合，君出入冈岭，穷涉险阻，循流溯源，策杖徒行，无间寒暑，诸年少或愧不如”^①。

就在这一年六月，郭嵩焘与刘蓉（1816—1873，字孟容，号霞仙，湘乡人）成为“莫逆”之交。刘蓉“少负奇气，能文，不事科举，与同邑曾文正公、罗忠节公力求程朱之学，蹶而从之，尤务通知古今因革损益，得失利病，与其风俗及人才所以盛衰，慨然有志于三代，思一用其学术以兴起教化”。35岁时，刘蓉才在邑令朱孙诒的关照和父亲的督促下，得以“补弟子员”。据说，那完全是他们导演的一出双簧，以便刘蓉拥有起码的进入官场、进入主流社会的资格。刘蓉性情开朗诚恳，一无隐饰，但为人老成，学思醇正，此时，自然没有“补弟子员”，也就是说，连秀才都不是。由此也可见他求学的目的并不在于功名，而以优入“圣域”、“谈道著书”为尚。

就在郭氏与刘蓉一见倾心时，正好，曾国藩从京师就试归，逗留长沙。曾国藩与刘蓉前一年已经认识并相好——“见刘公蓉于朱氏学舍，与语大悦，因为留信宿乃别”，刘蓉介绍曾国藩、郭嵩焘认识。三位日后得大名的“有志青年”，在长沙的一个客栈里“同居”了近两个月。据郭嵩焘后来回忆，他们的相处与往还，真是令人怦然心动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是心灵的拓展，更是精神的提升，所谓“怦怦然觉理解之渐见圆融，而神识之日增扬诩矣”^②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眼界越来越广大，心气越来越高。夸张一点说，这是一次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令人心驰神往的相聚，他们日后的友情，更加让人向慕。

第二年，曾国藩再度来到长沙与郭嵩焘、刘蓉相聚。适逢鸟语花香的春天，良辰美景，少年心事，他们孤芳自赏，交杯酬唱，厚望殷许，雅志互期。此时，郭嵩焘二十岁，刘蓉二十二岁，曾国藩二十七岁。

数十年后，郭嵩焘临终缠绵枕上时，还作诗怀念：“及见曾刘岁丙申，笑谈都

① 《郭嵩焘诗文集》268、269页，岳麓书社1984年。

② 《玉池老人自叙》，光绪十九年养知书屋刊，下同。